

构建关于中美关系的正确战略认知

——基于美国认知场域变化与对美舆论策略调整的研究

欧阳向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正确战略认知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从“繁荣叙事”到“安全叙事”,美国国内认知场域的变化使其对华政策逐渐走向偏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是中美关系紧张的认知来源,而相对实力下降是其不断强化“威胁认知”的主要依据。而中国视美国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希望与美国相互“视为伙伴”,形成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此,构建正确战略认知的途径包括:常态化元首会晤机制、完善高层战略沟通渠道、增进对彼此发展模式的理解、加强军事安全互信建设和推动多边合作等。鉴于中美舆论场域已发生重大变化,对美舆论斗争应以经济成就为坚实支撑,让美国看到“共同繁荣”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增强在国际科技舆论场的话语权,让美国看到“安全叙事”下中国实力不逊色于美国;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构建有效的舆论斗争策略,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舆论合作。

关键词:战略认知;中美关系;安全叙事;舆论斗争

中图分类号:D82;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25)04-0065-10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正确战略认知对于中美关系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从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到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再到利马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多次强调“共同树立正确认知”^①，“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②,将“正确的战略认知”列为中美关系四

年来的七条经验之首^③。中方始终强调,双方应避免战略误判,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基础,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然而,从“繁荣叙事”到“安全叙事”,美国国内认知场域的变化使其对华政策逐渐走向偏执。化解美国对华刻板印象,构建正确战略认知,是扭转中美关系的关键。

收稿日期:2025-06-1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2023YZD049)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①《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7日。

②《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4年4月3日。

③《如何把握中美关系走向——新华社三论中美关系》,新华网,https://www.news.cn/world/20241224/be3b56ba0a964612a4ddbc22c10553da/c.html。(2025-03-25)

一、美国认知场域的变化

2024年9月10日,在ALL-in年度峰会上,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的精彩辩论,将美国“安全叙事”与“繁荣叙事”的逻辑和分歧展现得淋漓尽致。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存在激烈的安全竞争,美国需在各领域与中国竞争以保持全球霸主地位;萨克斯则认为与中国对抗升级易引发战争甚至核战,美国应通过科技革命做大蛋糕,而非零和博弈抢蛋糕^①。如果说萨克斯代表美国发展经济学派的观点,倡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那么米尔斯海默则代表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国最大化扩充权力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美国政治学家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无法两全其美,即对一个方面的重视必然导致另一方面受损^②。近年来“中国威胁论”逐渐被“中国霸权论”所替代,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国内认知场域从“繁荣叙事”向“安全叙事”的转变,也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到遏制乃至敌对的运动轨迹。

中美建交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大量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玩具等;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快速增加,从高科技产品到农产品都在中国找到了庞大市场。冷战结束后,美国虽一度对华实施制裁,但两国经贸关系持续推进,起到了“压舱石”作用。2001年中国入世加快了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5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6882.8亿美元,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单个国家看)。“共同繁荣”的理念促进了中美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广泛展开。在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如数学领域的代数、几何、数论等纯数学方

向,物理学领域的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光学方向,航空航天领域的飞机零部件制造、航空安全技术研发,通信和网络安全领域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犯罪打击,海洋科技领域的海洋探测技术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中美彼此有合作需求和合作基础。美国的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中国的科研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互派学者访问、开展联合学术研讨会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逐年递增,人数最多的2019~2020学年达37.3万名。美国的文化产品如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快餐文化、汽车文化、现代艺术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京剧、武术、手工艺、绘画、节日文化、美食等也在美国得到了更多展示与传播的机会。

中美建交时国际格局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战略平衡的需要以及对中国庞大市场潜力的初步认知,开始推行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界的部分人士看到了与中国开展广泛合作的机遇,希望通过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同时也期望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对中国产生形塑作用。美国推动“繁荣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但在特定时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双方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相互依存使得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分歧时更加谨慎,倾向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特别是在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标志性领域如5G通信、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与美国在这些关键产业的全球主导权形成了潜在竞争。美国企业界部分势力为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推动政府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为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争取时间。美国一些政客将国内部分地区的就业问题归咎于中美贸易关系,声称中国的出口优势抢夺了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成为对华贸易战和遏

①<https://www.audible.com/podcast/John-Mearsheimer-and-Jeffrey-Sachs-All-In-Summit-2024/B0DJCJSHYC>. (2024-12-23)

②Richard Rosecrance,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Richard Schultz, Roy Godson, and George Quester eds., *Security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assey's Publishers, 1997, p.211.

制政策出台的民意借口。美国一些保守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蓄意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宣扬“中国威胁论”,为其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所谓的“价值观依据”。上述势力共同作用,推动改变了曾经基于交流合作的“繁荣叙事”,转向遏制中国的“安全叙事”。

二、“安全叙事”导致美国对华错误认知

2017年特朗普上台给中美关系带来方向性转变,他是自尼克松以来首位让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发生180度大转变的美国总统^①。有研究认为,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尽管中美之间在拜登时期恢复了一些对话沟通机制,但由于特朗普可能停止这些机制以及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对中国的公开批评,双边沟通的难度加大,合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中美关系趋于恶化的可能性显著上升。”^②只有了解美国对华错误认知的具象和由来,才能制定合理的破解之策,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扫平障碍。

(一)“安全问题”成为美国两党遏华借口

美国两党将“安全问题”作为遏华借口,根源在于其国内政治、经济与战略层面的多重困境。从国内政治角度而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两党为了争夺选民支持,在诸多国内议题难以达成共识的背景下,选择将中国视为共同面对的“外部威胁”,驱使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对外关系上,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优势逐渐丧失,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美国一些政客错误地将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后果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发展模式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试图通过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来缓解自身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从战略层面分析,美国长期奉行全球霸权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通过在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无端指责和遏

制手段,美国试图维持其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确保其能够继续主导国际秩序,按照自身意愿塑造国际规则。

以最近三次大选为例。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频繁提及中国话题,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完全归咎于中国,声称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掠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他提出要对美国征收高额关税,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进行严格审查,并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正常岛礁建设是“军事扩张”行为,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在多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激昂地宣称“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对中国说不”,言辞极具煽动性,吸引了大量对美国经济现状不满的选民,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地区的选民。而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主要将反华矛头指向人权、网络自由、中国对非洲投资和钓鱼岛政策,议题相对弱化和分散。对华强硬为特朗普赢得了摇摆州的投票,因此他在当选总统后迅速启动了一系列对华措施,如对中国进口的钢铁、铝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大幕。他任命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认为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发展模式不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产业政策对美国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因此坚决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来重塑中美贸易关系,使其符合美国的经济与政治诉求。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涉华问题上频繁发表煽动性言论,主张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敏感专业,推动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与政治孤立,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2020年总统大选体现了两党在对华议题上的竞争与延续。特朗普在寻求连任过程中,继续强化其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扩大对华制裁清单,在科技领域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力度,试图切断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拜登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也不甘示弱,提出要联合美国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强调在人权、气候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两党候选人在对华议题上竞相展示强硬态度,使对华遏制成为

^①Laura von Daniel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under Trump and Biden*, SWP Research Paper, 2024.

^②周建仁、王洪:《2025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国际政治科学》2025年第1期。

此次大选的重要辩论焦点。尽管拜登最终赢得大选,但两党在对华遏制这一总体方向上的共识进一步加深。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部分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还在外交、科技、军事等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遏制举措,如加强与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演习,推动所谓“民主国家联盟”来对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任命的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等人人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历史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现如今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

2024年美国大选再次展现了两党在对华议题上的强硬态度。特朗普声称将对全部国家加征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六成的关税,并提出要“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甚至考虑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将台湾问题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曾叫嚣可凭自身实力和盟友牵制让台海冲突“消失”,为自己竞选增加筹码。拜登一方面强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通过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与盟友的关系,试图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技术产品出口、进行安全指控、出台“不卖就禁”法案等手段,极力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如限制华为5G、对TikTok进行封禁等。由于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民主党中途换将,而哈里斯作为新的候选人没有足够的政绩,也始终未能提出推动变革的政策,最终特朗普胜出。2024年10月28日,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时间发布针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的投资禁令,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对中国相关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试图从资本金融方向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全面遏制。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上台,并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和加强技术封锁的措施,后续恐将进一步采取限制投资、限制科研交流与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孤立中国、煽动反华情绪等措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两党在竞选纲领上

有差异,但在反华遏华问题上已形成“合流”。

美国两党以“安全问题”为借口的遏华行为是一种短视且危险的战略选择。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对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发生贸易摩擦和经济对抗不可能不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科技脱钩可能导致全球科学界和产业界出现分裂态势,不利于全球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美国的遏制策略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对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产生重大冲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过度强调对华遏制,也会削弱多边主义的力量,不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美国国会立法将对华遏制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立法将对华遏制制度化,针对中国的系统性措施已涵盖制裁、科技封锁、军事干预、经济围堵等多个领域。这些法案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通过国内法取代国际法,对他国实施“长臂管辖”,维护其全球霸权,其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规则和中美关系稳定。

这些法案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人权等六大核心议题,说明美国正在形成对华从经济遏制到全领域对抗的全方位、体系化布局。自《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明确提出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①抗衡中国以来,近年来加速通过的系列法案不过是这一思路的扩展和延伸,但其触角已深入以往中美合作的各个方面,破坏性极强。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民用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如高超音速武器、网络战系统)被美国视为“颠覆性威胁”。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不仅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制程芯片,更通过“芯片基金”支持美国国防部主导的军事技术研发,直接服务于“抵消战略”。美国国防部报告反复渲染中国“将民用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为经济制裁向军事遏制延伸提供依据^②。美国意识到其军事装备如F-35战机、导弹防御系统等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包括如稀土、电子元件等,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依赖被视为“战略脆弱性”。

①<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is>. (2025-05-28)

②美国国防部在2023年更新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中,将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列为“技术扩散威胁”的核心来源,指控中国通过“非对称创新”模式(如民用企业主导前沿技术研发后转军用)削弱美国技术优势。<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561549/dod-releases-2023-report-on-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 (2025-05-20)

表1 近年来美国主要涉华法案

年度	法案名称	主要涉华内容
2017	《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	扩大对所谓“美国对手”(主要针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制裁权力
2018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从传统“控制权”交易扩展至非控股投资、技术转让及房地产收购等领域
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涉及集成产业、科技、安全、外交、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后续被整合为《芯片与科学法案》
2021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禁止美国企业进口新疆地区生产的部分产品,除非企业能“确凿证明”供应链中不存在强迫劳动
2022	《美国竞争法案》	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资金支持,并强化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2022年2月由众议院通过,但尚未成为法律)
2022	《芯片与科学法案》	限制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十年内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投资扩大半导体生产
2023	《2023年中国金融威胁缓解法案》	要求美国财政部评估中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的风险,并提出应对建议(众议院通过,但内容空洞,约束力有限)
2024	《生物安全法案》《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案》《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中国货币问责法案》《台湾冲突吓阻法案》等25项	涵盖科技、农业、金融、台海等领域(2024年9月由众议院通过,但参议院尚未批准)
2024	《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强化台湾地区的反装甲、反无人机、远程精准打击、电子战及反电子战、水下作战及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实力
2024	《农业安全风险审查法案》	加强对外国实体(尤其是中国)收购美国农地的审查(立法初期阶段)
2025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调查人员执照法案》	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强对受制裁国家的情报收集能力(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尚未批准)
2025	《台湾非歧视法案》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众议院于2025年2月提出,参议院于5月跟进)
2025	《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	禁止国土安全部采购中国电池(处于立法流程中)
2025	《战略国土情报和执法以抵御中共法》	扩大情报机构对中国在美“影响力活动”的监控,要求联邦机构共享涉华情报并加强执法合作(处于立法流程中)
2025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在G20、APEC等多边场合为台湾发声,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组织会议(2025年5月众议院通过)
2025	《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授权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行政协议”(如司法互助、海关合作),并允许台湾驻美机构使用“台湾”而非“中国台北”名称(2025年5月众议院通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些法案如《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案》中关于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条款,实质是通过经济手段保障军事安全,支持本土替代产能建设。美国还将人权、民主等议题武器化,通过法案构建“价值观联盟”,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的三重联动逻辑,体现了美国对现代战争形态如混合战争、供应链战的认知升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两年美国有关台湾的立法陡然增加。《台湾冲突吓阻法案》和《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以“保卫台湾”为名,强化对台军事支持,如设立“区域紧急库存”并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友的军事库存形成联动、提供反装甲/反无人机装备、联合训练与情报共享、构建“海岸拒止—区域反制”体系等,并授权在“台海冲突”后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如冻结官员资产、离岸金融限制、切断SWIFT通道等。此类法案直接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实质是通过将“战略模糊”升级为“战略清晰”制造对华威慑。美国“以台制华”的复合博弈策略浮出水面,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对俄制裁模式高度相似,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阻断中国复兴。

美国涉华法案数量激增、力度升级的背后,是多重战略焦虑与利益博弈的叠加。美国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大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法案中频繁出现的“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保护关键利益”等表述,实质是通过法律工具固化其在科技、军事、金融等领域的垄断优势。一旦中美矛盾激化,美国有可能采取“经济脱钩—科技封锁—军事威慑—外交孤立—意识形态攻击”的全方位遏制体系,对中国展开“立体绞杀”。这种“全政府战略”超越了传统的“接触+遏制”模式,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冷战”阶段。

(三)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夸大“安全叙事”影响政策走向

美国的一些智库和战略分析家也在推动遏制中国的“安全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哈德逊研究所长期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夸大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对美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军

事力量在周边海域、空中以及太空领域的拓展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提出美国应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建设以制衡中国。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度《国防调查》披露,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人呈上升趋势,从2018年的55%上升至2023年的77%,其中51%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①。“美国智库还赋予对华技术竞争以极强的价值观色彩,认为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基于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组织模式,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仅关乎美国及其盟伴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还关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声望和影响力,将对‘民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②美国企业研究所常发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中国威胁论”,强调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维护美国利益等。这些战略智囊通过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形式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播“中国威胁论”,影响美国国内舆论和外交政策走向。美国军工复合体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也倾向于推动对华遏制政策。大型军工企业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等,将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渲染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从而促使政府增加军事开支,采购更多先进武器装备。

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如福克斯新闻等,长期在涉华报道中秉持负面立场。从经济上的贸易不平衡、产业竞争,到政治上的制度差异、人权问题,再到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全方位地向美国公众传播中国的负面形象。例如,在报道中国的科技发展时,夸大中国科技企业所谓的数据安全问题和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将中国正常的科技进步描述为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美国技术成果的结果,引发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意和防范心理。在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举措时,往往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进行解读,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项目描绘为中国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而忽视其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稳定的积极贡献,从而在舆论层面为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营造民意基础;美国媒体在两党政治势力的引导下,大肆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虚假话题,引发美国消费者抵制中国新疆棉花制

①2023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Survey, survey-press-release-2023-final.pdf, <http://www.reaganfoundation.org>. (2025-04-06)

②汪道、李国强:《美国智库对人工智能影响国际关系的观点与启示》,《智库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1期。

品,同时也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抹黑中国的舆论浪潮。部分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领袖,包括一些政治评论员、自媒体博主等,在推特等平台上散布关于中国在南海地区正常军事设施建设是“军事挑衅”的言论,或者声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经济合作是“债务陷阱外交”。这些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影响了大量美国网民的认知,使得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舆论氛围逐渐浓厚,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遏制态度的形成。

随着“安全叙事”在美国“深入人心”,美国的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外交战略从多边主义逐渐向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转变。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认为这些协定限制了美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自主性,要求盟友增加军事开支分担防务责任,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军事部署,将重点聚焦于应对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威胁,如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在东欧地区增加军事力量应对俄罗斯。美国国内安全机构权力也得到进一步扩充,联邦调查局(FBI)、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在监控国内潜在安全威胁方面拥有更大权限。移民政策收紧,在网络安全领域投入大量资源,美国的行为变得富有攻击性。

三、影响和重塑美国对华认知的策略思考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是中美关系紧张的认知来源,而相对实力下降是其不断强化“威胁认知”的主要依据。“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至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不断演变,同时,历经酝酿期、实施期、推进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深入,已进入强化期,严重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①中国始终认为,宽广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应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对抗和冲突。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是客观事实,但竞争应是基于规则的、公平的,应将竞争置于健康、可控的轨道上,而不是通过单方面的制裁、贸易壁垒或技术封锁来确保优势地位。美国近年来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严重损害了两国

关系和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性,同时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清醒认识中美关系的“基本盘”

中国视美国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希望与美国相互“视为伙伴”,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②目前,由于双方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需要妥善处理的分歧与矛盾,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策略是既合作又斗争,力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构建平衡稳定、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

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近年来,美国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的做法与中国主张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背道而驰。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涉港、涉疆、涉藏、“人权”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而美国一些政客不断打“台湾牌”,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升级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并组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持续推进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而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安全问题。近年来,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坚决反对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坚定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

中国重视与美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认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美具备强大的创新实力与巨大的市场潜力。两国应加速双边投

①朱锋、凌邦皓:《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透视》,《国际展望》2025年第2期。

②《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人民日报》2024年3月28日。

资协定(BIT)谈判,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鼓励双方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深度合作,实现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的高效流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与稳定。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是促进中美经济合作深化的关键一步。目前,中国已在5G通信、量子计算、人工智能、AI应用、高铁技术、新能源、无人机技术、半导体封装和航天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部分领域已领先于美国或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也愿意对美开放科技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人类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与美国在维护全球稳定和应对共同挑战方面有合作空间,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持批评态度。中国认为,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而不是由一国或少数国家说了算。美国近年来频繁“退群”,屡屡破坏多边合作机制,对全球治理造成了严重冲击。中国则始终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社会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重要力量。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在理论上涵盖所有国家,当然包括美国。

(二)努力推动美国对华认知重塑的途径

霸权主义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美国一些政客习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其他国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和他国利益之上,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构建中美正确战略认知,首先需要美国摒弃霸权思维和单边主义,尊重他国主权和发展权利,这是对话与合作的前提。

常态化元首会晤机制和完善的高层战略沟通渠道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导航仪”。定期且稳定的元首直接对话,能使两国元首坦诚交流核心关切、战略意图与长远规划。通过面对面深入沟通,可有效避免因信息传递失真、决策层

误读引发的战略误判,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基调,为后续各层级交流与合作提供政治指引。除元首会晤外,构建涵盖外交、国防、经济等多领域高层官员的定期战略对话机制至关重要。双方定期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外交安全对话,就宏观战略、经贸政策、军事安全等核心议题交换意见,能及时掌握对方政策动向,消除因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战略互信。

双方需要增进对彼此发展模式的理解。中国可向美国全面展示自身多元包容发展模式的成果与特色,介绍中国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以及在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方面的探索。通过组织美国工商界参与进博会、广交会等经贸活动,让其亲身体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邀请美国智库、高校学者深入中国基层,了解中国在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推动两国文化团体互访,让美国民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魅力。美国也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自身发展路径中的优势与不足,尊重中国人民基于自身国情作出的发展选择,停止在人权、民主等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造谣,客观认识中国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减贫事业、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积极贡献,才是增进两国相互理解、构建正确战略认知的关键所在。

在安全领域,中美应重启或加强军事对话与交流机制,定期举行高层军事领导会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建立军事危机沟通热线等,增进对彼此军事行动的了解与信任,降低因军事误判引发冲突的风险。在中美执法和安全领域,双方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个案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视化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提升两国关系的“安全系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国际事务上,中美应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关键机构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提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双方可在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等方面加强合作,发挥联合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核心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

中美应携手反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推动WTO规则的现代化改革。双方可就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新议题进行协商,完善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促进全球经济的开放与繁荣。在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开展发展与安全政策对话合作,促进地区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在全球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建立联合工作组,整合双方资源与技术优势,共同应对安全威胁。通过多边合作,让美国认识到共同安全观的重要性与可行性,逐步转变过度依赖军事优势的安全理念,实现从追求单边军事优势向构建共同安全体系的转变。

(三)适当调整对美舆论策略

对美舆论首要在于统一认识,然后才是策略性和技术性应对。社会各界认识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关系的特点,不同时期表现为侧重不同。有人对“繁荣叙事”时期的合作记忆犹新,不理解中美何以成为“战略对手”,甚至将其归咎于“中国战狼”,全然看不到先有“狼”的存在;也有人对“安全叙事”高度警惕,急于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甚至提出“主动脱钩”,哪怕还没做好各项充分准备。竞合关系的另一特点,是不同领域的感知不同。在经济领域,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虽然近年来美国频繁发起贸易摩擦,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但企业界和经济人士多认同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希望开辟新的市场。在科技领域,美国是世界上原始创新最成功的国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现在转向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在军事领域,虽然中美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体现为不同时间、不同事件、不同人群上的不同态度和倾向,使得对美舆论斗争既不能松懈,也不能过激,即要在合作与斗争中找到舆论的平衡点。

美对华舆论场域已发生重大变化,“安全叙事”的盛行,使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围绕安

全优先展开。从外交上看,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维护自身所谓的安全利益,这与中美共同繁荣所依赖的多边合作框架背道而驰。在国内,美国政府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塑造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的形象,这种舆论氛围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使得美国国内支持中美重回共同繁荣道路的声音被削弱。而且,美国部分政治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将中美关系政治化,利用安全问题煽动民意,进一步阻碍了中美关系回归到以共同繁荣为导向的正轨,也加大了中国在舆论上引导美国重回正确轨道的难度。西方一些媒体长期对中国存在偏见,选择性忽视中国的发展成就,歪曲报道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其实质是通过抹黑中国来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虽然近年来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美国媒体相比,在国际新闻采集、传播范围和受众覆盖等方面仍存在差距,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难以迅速、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声音,难以打破西方媒体的舆论偏见,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提升。

如何形成对美舆论优势?

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在舆论斗争中赢得主动的基石。一方面,中国应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固态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等关键瓶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占据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要份额。另一方面,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经济成就为舆论宣传提供坚实支撑,让美国看到“共同繁荣”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第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23页。

平科技自立自强”^①。争取在科技实力上取得突破,这已经成为左右国际局势的重要变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因素。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大科研资源投入,汇聚顶尖科研人才,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例如,在5G通信技术的基础上,提前布局6G技术研究,保持在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标准制定,让中国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标准得到国际认可,增强在国际科技舆论场的话语权,改变在科技舆论方面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局面,让美国看到“安全叙事”无法遏制中国科技进步。

第三,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提升国际舆论影响力至关重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对外文化贸易等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例如,举办“中国文化年”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中国传统艺术、文学、哲学等文化瑰宝。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如国产动画电影、网络文学等走向国际市场,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目光,在国际舆论场树立中国文化的良好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第四,构建有效的舆论斗争策略。在对美舆论斗争中,要明确斗争方向和重点。深入研究美国舆论转变的背后逻辑和动机,分析其舆论攻击的目的和策略。针对美国在贸易、科技、人权等领域的不实指责,制定针对性的舆论反击策略。例如,在美国指责中国贸易不公平问题上,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案例,阐述中国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中的贡献,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避免陷入美国设置的舆论

陷阱,不被其牵着鼻子走,保持自身舆论宣传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第五,有效运行先进传播工具和方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舆论传播方式已难以满足舆论斗争的需求。TikTok和小红书等在美国引起的传播内容和体验改变值得重视。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制作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内容,以短视频、动画等形式传播中国观点和立场。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分析美国受众的兴趣偏好和信息需求,实现个性化传播,提高舆论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

第六,打破美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垄断,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舆论传播主体合作。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媒体交流与合作,分享新闻资源,共同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例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媒体合作联盟,共同报道“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展现合作共赢的理念。同时,加强与欧洲、亚洲等发达国家的舆论沟通,寻求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共识,共同发声,制衡美国的舆论霸权。通过国际舆论合作,形成多元声音相互呼应的舆论格局,增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通过“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促使美国树立正确战略认知,推动美国回归理性,探索中美共存之道,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持续向美国传递“战略清晰性”(核心利益不可妥协)与“策略灵活性”(非核心领域可合作),有望逐步引导美国形成基于现实的对华认知,即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颠覆者”,而是“建设者”。这种认知的转变,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的前途命运,更将决定21世纪全球格局是走向冲突分裂,还是和平共生。

[责任编辑 张明之]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5页。